

研究論文

「中下階級」或「工人階級」？ ——主觀階級認同的社經基礎*

薛承泰**

一、前言

社會學萌芽以來，社會學家對於社會現象的諸多關懷，「社會階層化」(social stratification) 即為其中一個主要的著力點，這些有關階層化的研究者通常將重點置於(1)探討社會「不平等」(inequality) 現象，也就是資源分配與集中的問題；(2)階層僵化的程度 (rigidity of a stratification)，也就是人們在社會位置的持久性；(3)階級承襲的過程 (ascriptive processes)，也就是強調先天因種族、性別、家庭環境等條件，對個人往後成就的影響；以及(4)地位結晶化的程度 (the degree of status crystallization)，即指個人對於不同種類財貨擁有

* 感謝「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研究小組提供資料，助理簡文吟和傅從喜協助蒐集文獻，更感謝許嘉猷和兩位匿名審查教授的寶貴意見。本文之相關研究「影響主觀階級認同因素之研究，乃由國科會支助，計劃編號 NSC 85-2417-H-002-008。

**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之間的相關性 (Grusky 1994:5-6)。環繞於這些課題當中,「階級」是其中一個核心概念,因為應用「階級」概念不論對個人行為(即微視面)或對社會的作用(即巨視面),都能有相當不錯的解釋。前者主要在探討「階級位置」(class location)對個人的影響,也就是不同的階級位置將會為個人帶來不同有形與無形的財貨;而後者主要在說明不同時空下「階級結構」(class structure)的性質及其社會、政治、經濟等的效應(Wright 1994a)。準此,階級的研究或所謂的「階級分析」(class analysis)也就成為社會學研究的主要領域之一。

過去數十年來,階級的研究在西方成為一股風尚,不單是因階級概念解釋社會現象所具有的說服力,社會的變遷與科技的進步,使得階級結構的內容與詮釋也產生極大的變化,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即是「中產階級」(middle classes)的興起。近年來國內階級研究受到西方的影響也跟著發展起來,有關「階級」(尤指中產階級)的定義、形成與特質的譯介與探討相繼出現(蕭新煌 1989, Hsiao 1989);此外,以本土為對象階級分類與流動的研究也開始出現(許嘉猷 1994a, 蕭新煌 1989)。值得注意的,在國內階級的經驗研究當中,除了採用西方階級概念與分析架構來描繪階級結構之外,民眾的主觀階級認同也常被視為「社會階級」(social classes)的主要來源;因此,國內社會科學許多調查問卷中,涉及主觀階級認同的項目屢見不鮮。可是經過數年調查經驗的累積,有關階級的研究也不斷出現,但對於主觀階級的內涵並未達成共識(蔡淑鈴 1989);如何來設計主觀階級類別?此問題仍困擾著學術界。

就以「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為例,歷年來(從一期一次至二期五次)(瞿海源 1991, 1992, 1993, 1994)就有七份問卷曾出現主觀階級認同項目(見表一)。

表一 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主觀階級認同次數分配：
第二期一至五次調查

	2/1(I)	2/1(II)	2/2(I)	2/2(II)	2/3(I)	2/3(II)	2/4(II)
上層	0.7%	0.8%	1.6%	0.6%	0.6%	0.6%	0.6%
中上	9.0%	9.0%	9.4%	10.0%	7.9%	5.7%	5.9%
中層	51.0%	51.7%	43.1%	52.2%	39.7%	38.6%	63.0%
中下	—	—	14.3%	—	13.6%	10.1%	19.5%
工人	27.7%	27.4%	21.1%	24.1%	27.9%	33.6%	—
下層	9.9%	9.8%	8.3%	11.2%	8.2%	8.5%	8.8%
不知道	1.7%	1.3%	2.2%	1.8%	2.1%	2.9%	2.3%
樣本數	2534	2532	2488	1139	2377	1408	1964

在這七份問卷中，基本上可看出有三種不同的設計方式，第一種設計包括上、中上、中、工人、和下層階級等五分類（二期一次 I 卷、二期一次 II 卷、二期二次 II 卷共三份問卷），第二種包括上、中上、中、中下、工人、和下層階級等六分類（二期二次 I 卷、二期三次 I 卷、二期三次 II 卷共三份問卷），以及第三種包括上、中上、中、中下、和下層階級等五分類（二期四次 II 卷一份問卷）。從表一觀之，社會變遷各期（卷）有關主觀階級認同的題目設計，似乎舉棋不定，而主要的癥結點在於「中下階級」或「工人階級」如何安置的問題，是擇其一？還是兩者都要？這不僅是社會變遷調查所面臨的困境，也是激發本研究的原動力。

「社會變遷」對於主觀階級問題設計的不穩定雖能引起我們進一步研究的興趣，然而也因為各筆調查所包含的內容不一，進行研究時難免需要篩選出適合的資料來進行分析或比較，某種程度地限制了研究的範圍；因此，本研究並不企圖應用這些資料來判別或證明台灣地區主觀階級應有的內涵（因為這會受到所選取調查資料的左右），而主

要將針對不同「主觀階級」的分類來描述其分佈狀況，並鑑於個人生命週期可能產生不同的階級認同，本研究將受訪者按性別與婚姻型態來加以區別，就其不同身份比較其主觀階級的社經基礎；藉此，或許有助於了解不同階級類別的設計可能帶來的不同效果。

除了針對不同階級分類方式描述其社經特質之外，對於個人（和配偶）社經特質以及家庭社經背景可能產生對主觀階級認同的影響也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簡言之，本研究嘗試找出這些主觀階級的社經基礎並比較不同階級分類，以及不同群體之間的相似性；主要作法乃透過比較「社會變遷」資料中五分類（包括上、中上、中、工人、下層階級）與六分類（增加中下層）階級類別的不同，採用「等級波比」（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其客觀社經指標成分。

其次，針對當前「工人階級」與「中下階級」的猶豫，本研究嘗試根據所選取的調查資料提供一些實證分析；易言之，因為增加「中下層階級」對其鄰近階級「中層階級」和「工人階級」可能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本研究將針對「工人階級」、「中下階級」與「中層階級」，以「多重類別對數模型」（multi-nominal logit model）來分析其社經相似性。¹

二、主觀階級認同研究的爭議

社會學早期的發展對於階級的看法一直很分歧，例如 Marx 從經濟力（economic forces）的角度來解釋階級的成因，依生產工具（the

1 本研究未將「工人階級」和「中下階級」與「下層階級」來比較，主要是因後者不論在採用五分類或六分類階級類別時，所佔比例都不高，變化也不大。

means of production) 的擁有與否來區分資本家 (capitalists) 與工人階級 (working class)。Weber (1969) 雖仍接受經濟的解釋，還加上社會地位 (social status) 與權力 (power) 來理解階級；此外，還有 Dahrendorf (1959) 強調「權威」(authority) 的分化作為階級衝突的根源。Shils (1968) 以「順從」(deference) 作為區隔不同社會地位的判準；Parkin (1971) 則以勞動力性質來區分「勞力」(manual) 與「勞心」(non-manual) 階級……，這些只是早期有關階級說法之犖犖大者，至於近年來對於階級分類理論的修正，雖大致上仍承襲 Marx 或 Weber 的說法，所呈現的分類架構也相當分歧（見 Durdy 1991 與 Wright 1989, 1994b 的整理）；² 在另一方面，實證研究所呈現的歧異更是目不暇給，即便研究者彼此所依循的理論相似，也都很難呈現共識（國內的情形見吳乃德 1994，蔡淑鈴 1989 的說明），而其

2 不過 Wright (1994a) 指出，從微視觀的階級分析來說，馬氏 (Marxist) 與韋氏 (Weberian) 傳統主要差別在於對三個基本「因果連結」(causal pathways) 即：物質利益 (material interests)、行動能力 (capacities for action)、與生活經驗 (lived experience)，強調的比重不同；而 Wright 尤其強調前者。首先，個人階級位置決定其物質利益，並進而影響其主觀認同與行為；因此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階級指標，其意義立基於人們面對經濟利益時如何在休閒 (leisure) 與消費 (consumption) 之間折衝。對於資產階級來說，他們可享有最好的消費物質卻不需犧牲其休閒，工人階級對於休閒與消費之間的妥協最缺乏機會，要增加消費只有犧牲休閒，中產階級情況雖比工人好些，休閒與消費之間的妥協仍是相當有限的。在這三種不同物質利益的連結中，韋氏傳統以「生活機會」(life chances) 來解釋階級情境 (class situation) 的形成；也就是各自「階級」在一（市場）經濟秩序下按其擁有相近的財貨、生活條件、經驗、和機會等而形成；階級之間沒有依存性，只不過因其市場經濟機會的不同而產生彼此在生活與其他方面（如權力或政治）的差異。相對地，馬氏傳統強調階級之間的依存性與對立性而以「剝削」(exploitation) 為主要機制，因此剝削者的物質利益不僅來自對被剝削者，還得仰賴被剝削者的勤奮工作；被剝削者一旦消失，剝削者的存在也就沒有意義可言 (Wright 1994a: 1-11)。

中的爭議，主要在於中產階級的內涵、主觀階級的分類、以及調查階級認同的方式。

2.1 中產階級的內涵

中產階級的興起引起了社會學階級分析的熱潮，也同時成為最具爭議的課題；這除了「中產階級」的定義與概念化的問題之外，還有對傳統階級理論的挑戰與妥協。傳統馬克思階級理論雖察覺到轉型階級 (transitional classes) (如小商品生產者) 與准階級 (quasi-class) (如知識份子) 存在於過去歷史以及當時的社會中；³ 無論如何，馬克思相信社會發展至資本主義生產模式 (capitalist model of production) 時，這些前資本主義下的產物終究會在階級鬥爭以及資本集中化的過程中被吞併，最後將取決於「資本家」與「工人」兩個主要對立的階級。到了二十世紀，事實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受到科技發展、市場多元與複雜化、組織的茁壯、分工日細的影響，階級發展的趨勢並非如 Marx 所預言的呈現清楚地兩極化發展 (bi-polarization)。Dahrendorf (1959) 就指出，現代社會的舊中產階級雖逐漸凋零，但新中產階級如經理 (managers)、專業人員 (professionals)、以及白領工人 (nonmanual workers) 卻不斷擴張。階級的意涵隨著社會變遷，有關技術、知識與管理的需求逐漸融入生產體系當中，成為人們在該體系中定位的新指標；Dahrendorf 尤其重視現代社會組織的

3 馬克思在「共產主義宣言」中謂，古羅馬帝國有貴族 (patricians)、武士 (knights)、庶民 (plebeians)、與奴隸 (slaves)；在中世紀社會有封建領主 (feudal lords)、扈臣 (vassals)、商賈 (guild-masters)、工匠 (journeymen)、學徒 (apprentices)、與農奴 (serfs) 之分。各社會都有階級或層級，而資產階級隨著封建社會的式微興起，取代了舊壓迫者而為一新的階級，並形構新的壓迫情勢與新的鬥爭局面 (引自 Giddens and Held 1982:19)。

重要性，並強調組織中權威關係（authority relations）來批判馬克思階級理論之不足。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前半對於階級的看法基本上受到社會發展的左右，而又以新興中產階級的不斷滋長與分化最引人注目，這個新興「階級」究竟會不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普羅化（proletarianization），使得傳統階級二元論歷久而彌新（Braveman 1974）。Poulantzas（1973）不同意此說法，認為新興中產階和「工人階級」的特性越來越不同而自成一有特色的「階級」，因為「白領」某種程度控制了生產工具或生產過程，並藉此而獲取來自「被剝削者」（exploited）所製造的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真正的「工人階級」是製造剩餘價值的「被剝削者」；因此「白領」並不能算是「工人階級」，他們「賺取薪津」（salary earners）卻未直接涉入產品的製造。Giddens（1973）也認為「白領」是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新）中產階級，而從事簡單商品生產模式（the mode of simple commodity production）者，即馬克思所稱的「小資產家」（petty bourgeoisie）則為「舊中產階級」。新中產階級因擁有相當教育與科技水平而具有不錯的「市場力」（market capacities），其所帶來的收入和其他形式的報酬不是那些單靠手藝或勞力者可比擬的（Giddens 1973:179）。然而，Giddens（1973）進一步指出，這種階級區隔到了二十世紀中葉也起了變化，主要是因為白領工作部門內部分化日益複雜，過去被視為具專業技術的文書作業者（clerical workers），現在已退居白領之末，他們的經濟報酬甚至不如藍領工作者；此外，藍白領界線也隨著科技進步相互重疊而且越來越不清楚了。

鑑於階級界線混雜而模糊的趨勢，並為避免「中產階級」在「階級二元論」架構下面臨類別化的尷尬，「新馬學者」（neo-Marxist）

Wright (1994a) 聲稱採用「和稀泥」(muddling through) 的方式在(傳統)階級關係(class relations)中建構「矛盾位階」(contradictory locations)。他先根據馬氏傳統以「生產工具的擁有與否」建構「擁有者」(owner)與「被雇用者」(employees)的基本階級關係,接者在「擁有者」中根據「是否雇人」(或雇人的多寡)區分成「資本家」(capitalists)與「小資產者」(petty bourgeoisie);在「被雇用者」當中根據「組織中的權威高低」與「工作的技能多寡」區別出「技術經理」、「專家」、「一般管理者」、和「工人」四類。在這六個基本類別中除了原本的「資本家」和「工人」,其他四類在原有的「階級二元論」架構下具有不同程度與面向的矛盾性格。例如,經理未擁有生產工具且具有受雇者身份故不能稱作「資產階級」,但他們卻能控制生產過程與管理工人而具有宰制(domination)的位置;另外,小雇主(small employers)雖擁有生產工具並具有剝削工人的特色,但他們也像小資產階級投入生產的行列;至於半自主受雇者(如專業工作人員),他們具有小資產階級特性控制自身生產活動的方向,卻如同勞工階級既未擁有生產工具且多少受到資本家的宰制(Wright 1989)。

很明顯地,Wright 有意將韋氏傳統中自主性(autonomy)與權威(authority)的概念納入馬氏階級架構中,然而他卻無意改變階級的原意(仍是忠於 Marx 階級論),並採藉 Romer (1982) 的說法確立「剝削」(exploitation)之於階級對立的重要性。準此,他再三地強調他的分析架構只是特定(資本主義)階級關係中的「階級位置」(class location)而不是「階級」本身。

2.2 主觀階級的分類

相對於「客觀」階級分類的分歧,主觀階級類別因一般民眾理解

有限，通常問題的設計不至於太過於複雜，但差異仍是存在的。最早出現主觀階級認同調查的「幸福雜誌」(Fortune) (1940)，以一般美國人爲對象，設計「上層」(upper)、「中層」(middle)或「下層」(lower)三種階級類別，發現有 79% 人選擇了中層階級。Centers (1949) 則是學術界首度研究主觀階級認同的學者，他探討四〇年代中美國的階級結構，即以「上層」、「中層」、「工人」、以及「下層」的四分類，來調查成年男子的階級認同。他發現，加入工人階級類別後，只有 43% 認爲自己是中層階級，而有 51% 認爲自己是工人階級。二十年後 Hodge and Treiman (1968) 鑑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認爲美國社會結構已有相當變化，而以全國成人樣本來重新研究美國的人的階級認同。他們對於階級的分類，又添加了「中上階級」(upper-middle class) 一項，發現 16.6% 的人認爲自己是中上階級，44% 與 34.3% 的人分別認爲自己是中層與工人階級，而 2.2% 與 2.3% 的人分別認爲自己是上層與下層階級 (Hodge and Treiman 1968:536)。階級的內涵，由三分類、四分類、而五分類；而以目前使用較廣泛的五分類中，有人以「中下層」來取代「工人階級」，也有人以「貧窮階級」來取代「下層階級」(Jackman and Jackman 1983)。⁴

4 除了「中下階級」或「工人階級」的安置方式之外，國外（尤指美國）對於主觀階級內涵的爭議是「中等階級」與「工人階級」的重疊性，以及「低階級」或「貧窮階級」的替代性問題。例如，Jackman and Jackman 以「貧窮」(poor) 階級來取代常用階級五分類 (upper, upper-middle, middle, working, and lower) 中的「下層」階級，發現選擇「貧窮階級」的比例爲 7.6%，比起「下層階級」比例（通常爲 1—3%）要高出許多 (1983: 17-18)。他們認爲，「下層階級」相對於「貧窮階級」較具貶抑之意，所以受訪者較不願意選擇該項，使得比例偏低；而「貧窮階級」是一種社會經濟類別，意義很明確。關於這點，Hodge (1986) 認爲有不少「工人階級」是貧窮的，反而會混淆「工人階級」與「貧窮階級」的意義，況且以經濟狀況作爲一階級類別，並不恰當。

在台灣也有學者從事主觀階級認同的調查，除了「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與「社會意向」調查之外，尚有黃大洲於民國 53 年與 64 年兩次鄉村社會調查。此外，魏鏞主持的五次民意調查，其中包括「上等」、「中上」、「中等」、「中下」、與「下等」階層的主觀階級問項；蔡淑鈴和瞿海源在民國 77 年進行「主客觀職業階層結構」研究時的調查（見蔡淑鈴 1989：83）；以及許嘉猷（1994a）主持的「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計畫」。

黃大洲於民國 53 年的調查結果，有 0.7% 的鄉村居民自認為是「資本階級」、20.2% 自認為「中產階級」、76.7% 自認為「勞動階級」；民國 64 年的調查比例則分別為 2.2%、27.6%、68.5%。魏鏞主持的五次民意調查，從民國 67 年至 72 年民眾自認為「中等階級」的比例從 51.7% 增加為 56.9%。民國 77 年蔡瞿的研究中以五分類結構式問題詢問受訪者，發現除了 13.5% 沒有回答或回答不知道之外，在 1,463 名回答者當中有 0.5% 的人自認是上層階級、1.5% 為資本階級、37.3% 為中產階級、54.3% 為勞動階級、以及 6.4% 自認為是下層階級（以上引自蔡淑鈴 1989）。

許嘉猷等採用「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計畫」資料，發現在回答所屬階級時，有 17.9% 的民眾認為自己是勞工階級、11.0% 中產階級、2.1% 中上階級、以及 69% 認為是其他階級；若要求受訪者在勞工、中產與中上階級當中選擇其階級認同，獲選比例依次為勞工 51.7%，中產 39.2%，中上階級 9.0%（許嘉猷等 1994）。從上述幾個國內主觀階級調查的情形來看，就光在階級類別的設計上就有相當出入，遑論比較這些調查的結果；而其中的問題仍以「中間階級」（或稱為中產階級、中等階級）的內涵與認知最為複雜。

2.3 主觀階級的調查方式

一般來說，主觀階級認同不僅在內涵上存在歧異，問題的敘述方式也會造成受訪者不同的「認同」，前述國內研究也有觸及此問題（許嘉猷等 1994，蔡淑鈴 1989），國外的研究則投入更多的心力在探討此問題。例如，在不提示階級類別的情形下，Gross（1953）發現，美國民眾有 20%不知道是屬於那個階級、15%給予不相干答案、5%沒有回答、14%不認為有階級的存在，只有 31%的人回答中層階級，11%回答是工人階級。此外，Kahl and Davis（1955）以開放式問法問民眾「美國社會有幾個階級？」，回答者從兩個階級到至少五個階級的答案都有，還有 18%的人認為沒有階級的存在或不了解階級。這些階級認同的比例分配和前述 Centers（1949）與 Hodge and Treiman（1968）的研究結果迥異，說明民眾對「階級認同」的認識，受到研究者對問題設計方式的影響。在國內，前述蔡淑鈴和瞿海源的研究也有類似的設計，他們發現 63.2%台灣民眾認為台灣是個階級社會，另外 20.4%卻認為沒有階級的分化。另外在許嘉猷等（1994）的研究中，則發現 84.9%受訪者認為台灣有階級的存在，而 15.1%不認為有階級的存在。

針對這個現象，Jackman and Jackman（1983）比較過去研究有關階級認同「限定選擇」（closed-choice）與「開放問答」（open-ended）兩種研究方式的結果。他們認為，限定選擇方式若對受訪者不產生意義，那麼「拒答」或「不知道」的回答比例應該和開放問答的結果類似才對；而事實上，儘管限定選擇方式難以避免對部分受訪者產生誘導的效果，民眾的回答顯然比在開放問答的情境時為清楚。Jackman and Jackman（1983）解釋，當人們面臨「您認為您是屬於哪個社會階級？」（What social class do you feel you belong to?），他可能

會陷於「社會階級」對他的意義是什麼的思考，而較難具體作答；相對地，在「限定選擇」的情況下，受訪者較會根據所提供的階級項目來研判或比較，而逕選擇為答案。因此，Jackman and Jackman 認為「限定選擇」是一個比較能接受的作法，然而接下來的問題仍是回到階級分類的問題之上，也就是主觀階級應包含哪些選項，以及多少選項才是恰當的？

從以上的討論可知，過去的研究已凸顯出主觀階級類別與內涵的分歧性，是無庸置疑的；此外，主觀階級也會因調查的方式、時間與樣本的不同、以及社會的變遷，令人難以比較不同設計的優劣，當然對於主觀階級的內涵也就不容易達成共識了。過去國內的研究也曾注意此問題，蔡淑鈴和瞿海源的「主客觀職業階層結構」（1989）以及許嘉猷主持的「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計畫」（1994）都曾使用開放式與結構式問法，而都發現結構式問法有助於提昇回答率，而且受訪者在提示階級選項中給予明確答案。

國內近年來由瞿海源教授所領導的「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自第二期第一次至第五次開始陸續出現主觀階級的調查項目，資料時間大致在四年之間共有七筆相關資料（見表一）。這些資料有助於我們對於民眾主觀階級認同的外貌與變遷趨勢的了解，尤其是各問卷中尚包含了相當一致的社會經濟基本資料，足堪提供研究主觀階級和社經指標的關係，這些也就是本研究的分析素材。

三、主觀階級認同的解釋因素

儘管主觀階級的類別與形式一直存在歧見，許多學者們仍然相信階級的概念是存在多數人的心中，而試圖解析人們如何認同階級，以

爲從人們所認同的階級中仍可以找出一些客觀指標。

3.1 主觀階級認同指標

早期 Centers (1949) 的研究就已注意到客觀指標和主觀階級的關係，而強調經濟因素是階級認同的主要根源。Hodge and Treiman (1968) 不以爲然，他們分析美國社會客觀社經特質（尤指教育、職業、收入）之間的相關，發現相關程度並不高；因此，他們認爲若光以這些特質爲主觀階級指標，那麼階級結晶化（crystallization）程度並不高，何況只依賴單一（經濟）特質，那會更加不可靠。Hodge and Treiman 接著提出較爲廣泛的客觀指標，包括教育、職業、收入等社會經濟「地位」（statuses）以及生活圈（包括居住社區、朋友、親屬等）；以爲現代工業化社會中，人們日常生活中習慣地接受制度中所提供的社會經濟特質與生活，這些都有助於階級認同的形成。

Hodge and Treiman 強調較廣泛的多元因素來分析主觀階級，這個論點成爲後來研究的主要路線；而 Kluegel 等人（1977）除了遵循此研究方向，並進一步考慮測量誤差，衡量主觀階級認同的有效客觀因素。後來的研究受到多元客觀階級因素觀點的影響之外，也開始注意到不同群體與身份的比較。以爲人們的主觀階級認同雖然會受到一般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會受到人們所屬社群的特色與個人的處境（例如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族群、宗教……等）而改變；因此，學者們開始在研究中加入一些「脈絡變項」（contextual variables）的考慮。例如，Jackman and Jackman (1973) 就曾重新分析 Hodge and Treiman (1968) 的研究，檢視黑人與白人階級認同的差異，而發現即使在一些客觀指標控制下黑人認同爲「中產階級」的可能性仍比白人低。Vanneman and Pampel (1977) 採用「勞力」

(manual) 與「勞心」(nonmanual) 的分類,比較不同民眾如何將一些客觀的社會經濟特質,作為主觀階級認同的指標。Robinson and Kelley (1979) 則檢視,在社經變項控制下「生產工具控制與否」以及「權威的位置」,對於主觀階級的解釋;他們發現這兩個因素對英國樣本產生較清楚的影響,相對地,美國民眾階級認同的主要因素仍是教育和職業地位。

早期 Centers (1949) 就已注意到已婚男女階級認同的問題,他以父親的職業作為背景階級的指標,配偶(或配偶父親)職業當作個人目前的階級,來探討世代間(職業)階級的流動。由於婦女勞動參與率不斷提昇,越來越多婦女擁有自己的職業與收入後,研究者對於傳統婦女的階級認同,以依附於父親或丈夫的階級為其自己的階級之說法,逐漸有了不同的看法。Erikson (1984) 發現瑞典在 1968 至 1981 年間,家庭主婦的比例從 45.8% 銳減至 13.8%,其中尤以丈夫職業為專業或經理人員的家庭主婦減少最為快速。這種現象在工業國家非常普遍,尤其是對於日益增加的已婚就業婦女,其階級的認同究竟傾向於自身的職業,按其工作的性質與職場中的權威關係來定位,或按其市場狀況 (market situation) (即除了包括個人收入、職業安全與晉升機會之外,家庭中其他人的經濟與家庭的生活型態等也是重要條件) 作為階級的認定基礎呢? Lockwood (1966) 曾針對工人階級作詳細的討論,強調周遭環境與人際關係的重要;而 Ritter and Hargens (1975) 在分析工作妻子的階級認同時,發現工作妻子 (working wives) 的階級的確會受到自己和丈夫職業的影響,這種夫婦共享式的階級認同的實證結果一再受到支持 (見 Hiller and Philliber 1978 以及 Van Velsor and Beeghley 1979 的整理), Philliber and Hiller (1978) 還進一步指出丈夫和妻子對於建構主觀階級認同的影響力並不

一致，而以丈夫較為明顯。檢測階級認同方式，較有名的例子應該算是 Davis and Robinson (1988) 的研究，他們按「自身」、「夫妻雙方」、或「配偶」特質的重要性，提出三種已婚男女階級認同的模式：「獨立模型」(independence model)、「共享模型」(sharing model)、和「採借模型」(borrowing model)。他們發現美國已婚婦女階級認同模式，從七〇年代以「採借模型」為主轉變為八〇年代的「共享模型」。

階級認同會因性別與婚姻狀況而異，其前提在於「家庭」(family) 乃為階級或階層的基本單位，這種看法似乎和傳統 Marx 階級論有些距離。由於進入二十世紀之前，男性的勞動力顯然是市場的主宰，「階級」的概念似乎忽略了女性，是時代的變遷使得男性為一家之主或唯一的代表的說法受到相當的衝擊。Goldthorpe (1983:470) 指出女性就業對家庭經濟的貢獻越趨明顯是原因之一，而越來越多女性成為一家之主的家庭型態，也使得階級認同變得複雜而模糊。在這種情形下，階級認同的分析勢必得考慮一個人生命週期中的位置，其家庭中相關成員（尤其是配偶與父母）的特質都有可能成為認同的參考指標。

3.2 台灣的研究

近年來在國內也開始出現有關主觀階級認同基礎的研究，以「階級結構與意識」(許嘉猷 1994) 在台灣的研究為例，當問及「台灣民眾究竟以什麼作為階級分類的基礎呢」？回答被使用最多的是「財富」(佔 32.2%)、其次是「職業地位」(佔 19.6%)、「政治地位」(佔 13.0%)、「地位等級」(佔 10.4%)、「生產工具」(佔 5.4%)、「職業技能」(佔 5.2%)、「教育程度」(佔 4.2%)、「管理權威」(佔 3.5%)、「士農工商」(佔 3.3%)、「族群」(佔 0.3%)、「其他」(佔 7.1%) 等(吳乃德 1994)。由於大多數民眾使用一個以上基礎來分類階級，吳乃德認為「台灣民

眾似乎比較屬於韋伯學派，而非正統馬克思主義者」(1994:124)；雖然如此，他仍兼採新馬 Wright 和韋派 Goldthorpe 的分類方式，分別和「中產階級主觀階級認同」（包括中上階級、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三類）做交叉分析。

除了主觀階級認同基礎的研究外，國內也開始有關客觀階級因素和主觀階級認同關係的研究，例如許嘉猷（1987,1989,1994b）的研究，曾按 Wright 的階級分類架構，從事對台灣地區民眾所屬性別、省籍、職業、行業、從業身份、收入、教育等來做交叉，並比較和美國在這些階級分配上的差別；蕭新煌（1994）則側重新中產階級的主觀階級認同與階級特性認知的分析。吳乃德（1994）進一步比較 Wright（1989）和 Goldthorpe（1987）的階級分類架構，並探討「客觀」階級和階級認同的關連。這些研究提供了台灣地區「階級」概念化的基礎以及台灣階級結構的概要，唯這些研究大都屬於描述與比較性質，對於形成主觀階級認同的客觀機制，著墨並不太多且缺乏做多變項控制的分析。黃毅志（1994）的研究則嘗試以多變項迴歸來了解台灣地區民眾主觀階級認同的決定因素，其作法在於仿造 Davis and Robinson（1988）探討形成主觀階級的歸因（來自於自己、配偶、或共同的客觀地位），這是首度國內有關主觀階級認同的客觀因素之分析。⁵

5 黃毅志（1994）的研究受限於單一橫斷資料（cross-sectional data）（只採用社會變遷二期一次 I 卷），雖然可用來分析與比較不同團體（單身男女、已婚雙方就業夫婦、與已婚一方就業夫婦）階級認同的差異，卻忽視了不同期調查具有相似（與相異）資料所能提供資料累積與比較的分析。

四、資料與變項的特性

4.1 資料的特性與分佈

本研究採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二期一次（I 卷）（民國 79 年）、二次（II 卷）（民國 81 年）、和三次（I、II 卷）（民國 82 年）中四筆資料，樣本數分別為 2,534、1,139、2,377 和 1,408，合計 7,458 受訪者作為分析對象。選擇這四筆資料，主要原因在於它們都包含了社會經濟指標中的幾個重要變項：本人教育、本人目前職業、受雇與從業身份、本人收入、配偶教育、配偶職業、父親教育、父親目前職業、母親教育。其中二期一次（I 卷）和二次（II 卷）主觀階級認同包括：上層、中上層、中層、工人、下層五個階級，而三次（I、II 卷）多了「中下層」一項。為了敘述的方便，本文稱前兩份資料為 A 組資料，後兩份資料為 B 組資料，兩者主要差別在於 B 組資料中多了「中下階級」的選項。剔除回答「不知道」、「其他」或「拒答者」，這四份資料有效分析樣本分別為 2,490、1,118、2,326 和 1,367 合計 7,301（見表二）。

值得注意的，A 組資料中的二期一次（I 卷）和二次（II 卷）主觀階級認同分佈情形相當類似，回答「上層」者平均佔總數的 0.7%、「中上層」佔 9.5%、「中層」佔 52.3%、「工人」佔 27.0%、「下層」佔 10.5%。而 B 組資料二期三次（I）和（II 卷）六個階級的分佈，在兩份資料間卻有顯著差別。其中關於「中下層」和「工人」的比例差異（分別為 3.5 與 6.0 個百分點）尤為關鍵（見表二）。

這個情形是不是因為兩份問卷的「中下層」和「工人」在問卷中

表二 台灣地區民衆的主觀階級認同：按調查資料分

資料別		上層	中上層	中層	中下層	工人	下層	樣本數	
A組	二期一次(I)	0.8	9.2	51.8		28.2	10.0	2490	$\chi^2=6.6$
	二期二次(II)	0.6	10.2	53.2		24.5	11.4	1118	df=4
	小計	0.7	9.5	52.3		27.0	10.5	3608	p=.16
B組	二期三次(I)	0.6	8.0	40.6	13.9	28.5	8.4	2326	$\chi^2=25$
	二期三次(II)	0.7	5.9	39.7	10.4	34.6	8.8	1367	df=5
	小計	0.6	7.2	40.3	12.6	30.7	8.5	3693	p<.01
B組	二期三次(I)	0.6	8.0	40.6	42.3		8.4	2326	$\chi^2=7.4$
	二期三次(II)	0.7	5.9	39.7	45.0		8.8	1367	df=4
	小計	0.6	7.2	40.3	43.7		8.5	3693	p=.12

安排的次序不同所導致呢？⁶如果將 B 組資料中「中下層」和「工人」合併為一項，二期三次（I）和（II 卷）的主觀階級認同分佈並無顯著差異（ $\chi^2=7.40$ ，df=4，p=.116）。由於兩筆資料屬於相同時間、相同抽樣架構下的隨機樣本；這個結果可能意味著，約有 3.5 至 6.0 個百分點的民眾會受到「中下層」和「工人」排序的影響。

在另一方面，若比較「五分類」和「六分類」的平均差異，那麼後者在「中層階級」的比例要比前者少了十二個百分點，卻在新加入的「中下階層」中產生 12.6% 的比例。這是否意味著「中下層」選項的增加，吸走了原本會回答「中層階級」的人？而「中下層」是不是也會對其他階級產生干擾呢？如果將前面「中下層」和「工人」排序的問題加入考慮，問題似乎更為複雜；無論如何，這個問題應該環繞

6 二期三次（I 卷）和（II 卷）主觀階級認同雖然都包括六項階級選項，但問卷中選項的排列並不同。前者將「中下層」置於「工人階級」之前，而後者將「工人階級」置於「中下層」之前。

於「中層階級」、「中下層」和「工人」三者之間。後面的分析，筆者將應用不同統計模型來嘗試釐清這個問題。

4.2 主觀階級認同按人口特性分

主觀階級認同除了在資料上呈現一些變化，也在不同社會類屬中有不同的分佈。本節將以年齡、性別與婚姻狀況為基礎，來看階級認同的差異。年齡的切割點以民國 45 年（含）出生為準，主要是因為該年出生者為九年義務教育開始實施時之主要人口群，而且該年出生者在社會變遷樣本中差不多是中位數的位置。首先，表三報告年齡別和主觀階級認同的交叉分析，在 A、B 兩組資料中都明顯地呈現差異；即出生於民國 45 年（含）以後者，在前三個階級所佔比例都高於出生於民國 45 年以前者，至於「下層」、「工人」、甚至「中下階級」年紀較大者的比例也是偏高的。

表四上半部分報告性別的主觀階級認同差異。在 A、B 兩組資料中，男女樣本約各佔一半，而且都呈現主觀階級認同的差異；一般來說，女性在前三個階級所佔比例都略高於男性，至於「下層」、「工人」、甚至「中下階級」男性比例都高過於女性。將婚姻狀況列入考慮

表三 台灣地區民衆的主觀階級認同：按年齡層分

出生年		上層	中上層	中層	中下層	工人	下層	樣本數	
A 組	民國 45 之前	0.7	8.2	47.7		29.1	14.3	1930	$\chi^2=90$
	民國 45 及以後	0.8	11.0	57.5		24.7	6.1	1678	df=4
	小計	0.7	9.5	52.3		27.0	10.5	3608	p<.01
B 組	民國 45 之前	0.6	6.6	34.6	13.2	31.6	13.2	2013	$\chi^2=153$
	民國 45 及以後	0.7	7.8	47.1	11.9	29.6	2.9	1680	df=5
	小計	0.6	7.2	40.3	12.6	30.7	8.5	3693	p<.01

表四 台灣地區民衆的主觀階級認同：按性別與婚姻分

		上層	中上層	中層	中下層	工人	下層	樣本數	
A組	男性	0.7	8.2	48.0		31.2	11.9	1808	$\chi^2=49.3$
	女性	0.7	10.8	56.6		22.5	9.1	1800	df=4
	小計	0.7	9.5	52.3		27.0	10.5	3608	p<.01
B組	男性	0.8	6.6	36.1	13.2	34.2	9.2	1822	$\chi^2=35.8$
	女性	0.5	7.9	44.4	12.0	37.3	7.9	1871	df=5
	小計	0.6	7.2	40.3	12.6	30.7	8.5	3693	p<.01
A組	未婚男性	0.4	9.0	52.7		29.6	8.2	476	$\chi^2=118$
	未婚女性	1.6	15.3	67.5		12.4	3.2	372	
	已婚男性	0.8	8.1	46.6		31.5	13.0	1265	df=12
	已婚女性	0.5	10.0	54.2		25.5	9.8	1306	
	小計	0.7	9.8	52.6		26.8	10.0	3419	p<.001
B組	未婚男性	0.7	5.1	40.0	12.4	35.1	6.6	410	$\chi^2=94$
	未婚女性	0.7	12.2	57.6	11.2	16.8	1.6	304	
	已婚男性	0.7	6.9	35.5	13.2	33.8	9.9	1370	df=15
	已婚女性	0.5	7.3	41.7	12.2	29.5	8.8	1504	
	小計	0.6	7.3	40.5	12.5	30.7	8.4	3588	p<.001

後，表四下半部分報告性別婚姻別（包括未婚男性、未婚女性、已婚男性與已婚女性共四類）和主觀階級認同的交叉分析。⁷很明顯地，A、B兩組資料的主觀階級在這四個群體間都呈現相當差異。值得注意的，一般未婚女性所認同的階級比其他三個群體為高（具有最高比例的上層、中上層與中層階級），這是A、B兩組資料的共同特徵。此外，已婚男性為下層階級的比例最高，為另一個共同特徵。

7 由於離婚、喪偶以及其他婚姻狀況所佔比例甚小，爲了分析的方便，這些類別將不納入本研究的分析中。

本研究除了考慮資料別、年齡別、性別與婚姻可能產生階級認同的差異之外，一些基本社經特質也是主要考慮的控制變項。首先，在受訪者本人方面，包括教育（以年計）、目前職業（以 Featherman and Stevens 1982 所修訂之 SEI 為測量，簡稱 RSEI）與每月平均收入（以千元為單位）。⁸ 家庭背景方面，則有父親教育（以年計）、母親教育（以年計）、以及父親目前或退休前職業（以 RSEI 測量）。⁹ 對於已婚者來說，控制變項還包括配偶教育（以年計）與目前職業（以 RSEI 測量）。¹⁰ 值得注意的，對於所有的職業與收入變項，因為出現不少的「遺缺」（可能是沒有回答、沒有職業、無法歸類、不知道或不適用的情形），在模型中則以虛擬變項來代表（1：代表遺缺），並以平均數代換入原本的職業與收入變項中。這個作法應用在多變項分析當中，主要為了控制「遺缺值」可能具有的效應或干擾。

表五與表六乃分別針對五分類（A 組資料）與六分類（B 組資料）主觀階級認同，關於社會經濟變項（包括本人教育、職業、收入、父母親教育、和父親職業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的描述。由於表中的有效樣本並不包括「遺缺」部分，因此數字的意義可以用來代表目前在職

8 選擇 Featherman and Stevens 1982 所修訂之 SEI 為職業地位測量的理由，請參見作者針對五種職業地位測量的評比（薛承泰 1996）。

9 Davis and Robinson (1988) 採用受訪者 15 歲時父親的職業地位，作為受訪者目前主觀階級認同的社經指標之一；這種作法有時空錯置之嫌，主觀階級認同不像「地位取得」（status attainment）研究，「父親職業」作為影響個人社會化階段（通常指青少年時期）中重要的家庭社經背景指標之一。

10 雖然本研究所使用的四筆「社會變遷」資料，都有受訪者的「受雇身份」和「雇主或自營」兩個變項，本研究並沒有用來分析，主要有兩個理由：(1)若使用所有類別以虛擬變項來代表，將使得模型分析變得繁冗；(2)在另一方面也需考慮到配偶的「受雇身份」和「雇主或自營」情形，而很不巧地，二期三次調查的(I)和(II)都沒有這些題目。

表五 台灣地區民衆主觀階級的社經性質(A組)*

社經變項	合計	上層	中上層	中層	工人	下層
本人教育	9.88	11.69	13.21	10.85	7.99	6.77
N=3608	(4.19)	(4.00)	(3.26)	(3.78)	(3.71)	(4.07)
本人職業**	35.39	52.14	48.59	39.49	26.87	26.84
N=433	(17.01)	(18.64)	(18.26)	(16.71)	(12.21)	(12.65)
本人收入	26.60	68.72	45.42	26.53	20.60	21.15
N=674	(39.18)	(109.18)	(76.00)	(32.82)	(16.83)	(42.64)
父親教育	5.81	7.50	8.79	6.56	4.23	3.33
N=3608	(4.74)	(5.33)	(4.67)	(4.66)	(4.11)	(4.19)
父親職業	30.80	35.31	40.99	32.77	24.46	25.66
N=1843	(16.71)	(19.33)	(19.20)	(17.38)	(11.61)	(13.26)
母親教育	3.71	4.62	6.16	4.31	2.31	2.00
N=3608	(4.15)	(4.97)	(4.60)	(4.13)	(3.52)	(3.40)

* 表格中的數字爲平均數(括號內數字爲標準差)

** 職業的測量爲 Featherman and Stevens Revised SEI

表六 台灣地區民衆主觀階級的社經性質(B組)*

社經變項	合計	上層	中上層	中層	中下層	工人	下層
本人教育	9.17	10.38	12.88	10.46	8.94	7.83	5.12
N=3693	(4.55)	(5.66)	(3.91)	(4.16)	(4.47)	(3.99)	(4.06)
本人職業**	34.93	51.10	48.59	40.01	35.70	27.40	24.16
N=2714	(17.29)	(18.68)	(18.26)	(17.45)	(15.96)	(12.97)	(9.59)
本人收入	29.17	57.22	47.41	32.43	27.98	21.33	21.72
N=2674	(28.51)	(44.03)	(47.84)	(28.69)	(25.64)	(16.11)	(29.47)
父親教育	5.14	5.67	8.08	6.03	4.64	4.08	2.98
N=3693	(4.44)	(5.81)	(5.16)	(4.49)	(4.00)	(3.88)	(3.63)
父親職業	30.40	43.18	40.36	33.09	27.99	26.82	24.51
N=3089	(15.65)	(22.93)	(19.40)	(16.78)	(13.41)	(12.85)	(10.37)
母親教育	2.85	3.63	4.73	3.62	2.43	2.05	1.06
N=3693	(3.59)	(4.51)	(4.33)	(3.78)	(3.36)	(3.01)	(2.35)

* 表格中的數字爲平均數(括號內數字爲標準差)

** 職業的測量爲 Featherman and Stevens Revised SEI

而有收入者。

表五（A 組資料）有幾個有趣的現象呈現出來。首先，「工人」和「下層」的社經性質似乎比「工人」和「中層」的社經性質接近些。其次，從中上階級以下，這些變項的均數大致上和階級排列順序一致。上層階級的職業地位和收入高於中上層，本人教育與父母親社經地位卻都低於中上層。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美國資料中（Jackman and Jackman 1983），這可能是因一般上層階級比例相當低（少於 1%），統計特性不太穩定，難以驟下定論。

至於六分類（B 組資料）主觀階級的社會經濟特質，也有上述的現象；從中上階級到下層階級一直是相當符合期望中的情形（見表六）。此外，因為 B 組多了「中下層」，如果階級具有階序性質，「中下層」的社經性質究竟應在那一個位置呢？從表六所顯示的結果，「中下層」很清楚地介於「中層」與「工人」之間，於是後面的研究即以此排序來分析。此外；若以 A 組資料作為參考架構，B 組資料「工人」的社經特質並沒有因「中下層」的有無而有明顯改變，這似乎意涵著「中下層」的介入，雖然可能影響「工人」和「中層」階級的分佈，也具有某種程度的獨特性。

五、主觀階級的客觀社經基礎

上一節對主觀階級認同的分佈，以及與相關群體與社經特質的關係作了初步的描述，本節即以多變項分析來探討主觀階級的社經基礎。由於階級認同可能隨個人的生命週期中地位與社經條件的改變而異，本研究即以前述性別與婚姻狀況為主要考量，針對「未婚男性」、「未婚女性」、「已婚男性」與「已婚女性」四個次級樣本來分析。因此，

這部分的分析將和 Davis and Robinson (1988) 以及黃毅志 (1994) 研究類似。然而，本研究為配合多筆資料的應用，採用的控制變項以及次級樣本的分類略有不同。更重要地，本研究採用「等級波比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而不是前兩個研究所應用的「最小平方方法」(OLS) 迴歸。¹¹

「等級波比模型」是「一般波比模型」(probit model) 的特例，「一般波比模型」和「一般對數迴歸模型」(logit model) 類似，都是非線性分析，處理依變項為二分類 (binary) 測量的迴歸模型，兩者差異主要在「餘值」(residual) 分配的假定不同；前者為「標準常態分配」(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而後者為「對數分配」(logistic distribution) (Aldrich and Nelson 1984)。和「一般波比模型」不同，「等級波比模型」在於處理依變項為「等級」或「順序」(ordinal) 的層次，並且具有二個以上等級的情形，主觀階級認同若以「上」、「中上」、「中」、「中下」、「下」表示，即是最好的例子。

模型假定依變項 y 來自於 y^* 這個「潛在變項」(latent variable)，而且 y^* 是呈常態分配 $-\infty < y_i^* < +\infty$ ， y 則是 y^* 的具體可測量變項； y_i 會等於 j ，如果 $\alpha_{j-1} \leq y_i^* < \alpha_j$ ($j=1,2,3,\dots,J$)，其中 $\alpha_1, \alpha_2, \dots, \alpha_{j-1}$ 是為「門檻」(thresholds)。套用「理性選擇模型」(rational choice model) 的說法，一個人認為自己屬於某個階級，乃經由諸多考量（即解釋變項）形成趨力，即所謂的選擇傾向 (propensity) y^* ，趨力超過某個臨界點（即門檻 j ），則傾向作某($j+1$)決定。

11 Davis and Robinson 在文章中也自認 OLS 迴歸並不妥當，由於在他們的資料中，階級五分類以 1, 2, 3, 4, 5 來測量，其分佈的偏態 (skewness) 尚不離譜，所以採用了 OLS 迴歸 (1988: 106)。經過數年，統計軟體已有相當進步，對於階級分類的階序概念，不宜再採用傳統的作法。

「等級波比模型」除了在推估的過程較一般 OLS 迴歸複雜之外，最大的不同在於門檻係數的推估。如果階級分為五個等級，則將會產生四個門檻係數（包括常數項），用來區別五個階級等級在自變項(x)控制下各等級的差異。個別等級出現的機率，可應用 $P(y=j|x,\alpha,\beta)=F(\alpha_j-\sum\beta x)-F(\alpha_{j-1}-\sum\beta x)$ 來計算，其中 $F(.)$ 為標準常態 CDF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β 為控制變項的係數 (Amemiya 1985:292)。

在分析之前，先針對這四類受訪者主觀階級的社經特質，作簡單描述與比較。表七與表八即分別針對五分類（A 組）與六分類（B 組）主觀階級說明這些社經變項的平均與變異。同樣地，表中的有效樣本並不包括「遺缺」部分，因此數字的意義可以用來代表目前在職而有收入者。

根據表七與表八，除了具有前述表五與表六各階層所具有的社經特質外，還有幾點共同特徵：(1)教育的平均年數都以未婚女性最高、其次為未婚男性、已婚男性、最少為已婚女性。(2)平均每月收入都以已婚男性最高、其次為未婚男性、已婚女性、最低為未婚女性。(3)已婚男性的職業地位與收入都高過於配偶（妻子），而已婚女性的職業地位與收入的都低於其配偶（丈夫）。

應用等級波比模型之前必須說明，由於 A、B 兩組資料的「上層階級」只佔全體的 0.6%，在等級波比模型中將「上層」與「中上階級」合併為一項來分析；因此，A 組資料由低至高（0—3）可分為四個等級，B 組資料由低至高（0—4）分為五個等級。此外，在男女未婚樣本的分析中，並沒有加入「年齡層」變項的控制，主要是因為，未婚是年輕人口群的特徵，並不適合用來解釋階級認同的變異。

表七 台灣地區民衆主觀階級的社經性質(A組)：
按婚姻狀況與性別分*

社經變項	合計	上層	中上層	中層	工人	下層
未婚男性受訪者						
本人教育	11.56	12.50	13.56	12.74	9.57	8.87
N=476	(3.43)	(4.95)	(3.45)	(2.26)	(3.47)	(4.45)
本人職業**	32.87	—	42.85	38.18	25.08	27.78
N=331	(15.90)	—	(23.32)	(15.91)	(9.88)	(14.65)
本人收入	24.72	7.00	23.19	26.47	23.19	21.97
N=367	(25.53)	(0.00)	(28.29)	(29.29)	(18.72)	(20.52)
未婚女性受訪者						
本人教育	12.47	14.17	13.82	12.79	9.76	8.83
N=372	(2.79)	(3.25)	(2.11)	(2.19)	(3.22)	(4.91)
本人職業	37.70	54.00	45.64	38.63	26.27	36.80
N=220	(14.50)	(0.00)	(16.31)	(13.57)	(9.48)	(11.80)
本人收入	16.95	14.75	14.33	18.46	13.76	9.33
N=279	(23.51)	(12.12)	(10.49)	(27.86)	(6.93)	(7.50)
已婚男性受訪者						
本人教育	10.17	12.60	13.73	11.20	8.70	7.64
N=1265	(3.96)	(3.75)	(3.28)	(3.78)	(3.37)	(3.26)
本人職業	36.33	56.00	52.31	40.96	28.45	27.54
N=1179	(17.80)	(19.17)	(18.21)	(17.85)	(13.46)	(11.86)
本人收入	35.30	136.25	81.04	35.16	25.26	23.98
N=1083	(52.26)	(138.35)	(117.04)	(40.89)	(17.39)	(49.02)
配偶教育	8.69	12.00	11.80	9.68	7.46	5.96
N=1265	(4.19)	(3.67)	(3.45)	(3.82)	(3.83)	(4.25)
配偶職業	35.22	48.00	48.30	39.63	26.94	28.28
N=529	(17.22)	(12.46)	(17.30)	(17.62)	(12.72)	(12.94)
已婚女性受訪者						
本人教育	8.67	9.33	12.50	9.50	6.61	5.45
N=1306	(4.24)	(3.20)	(3.42)	(3.86)	(3.55)	(3.92)
本人職業	34.50	40.00	47.41	37.89	24.62	22.82
N=583	(16.80)	(0.00)	(17.11)	(16.39)	(10.33)	(11.54)
本人收入	19.95	16.20	33.43	19.92	13.85	19.14
N=810	(25.06)	(25.05)	(32.73)	(21.79)	(13.93)	(43.80)
配偶教育	10.09	10.33	13.65	10.89	8.04	7.38
N=1306	(4.14)	(6.25)	(3.16)	(3.78)	(3.47)	(4.24)
配偶職業	36.30	44.25	50.74	39.72	26.15	26.60
N=1130	(18.42)	(20.84)	(19.10)	(18.17)	(12.07)	(14.56)

* 表格中的數字爲平均數(括號內數字爲標準差)

** 職業的測量爲 Featherman and Stevens Revised SEI

表八 台灣地區民衆主觀階級的社經性質(B組)：
按婚姻狀況與性別分*

社經變項	合計	上層	中上層	中層	中下層	工人	下層
未婚男性受訪者							
本人教育	11.93	12.67	13.57	13.04	12.06	10.89	9.15
N=410	(3.09)	(6.11)	(3.93)	(2.43)	(2.72)	(2.73)	(4.39)
本人職業**	35.69	50.33	48.00	42.07	38.03	28.36	26.06
N=317	(17.76)	(26.69)	(19.35)	(17.42)	(16.34)	(15.47)	(10.23)
本人收入	28.59	55.00	37.69	32.83	30.26	23.25	20.77
N=320	(19.91)	(35.36)	(22.04)	(24.30)	(18.99)	(12.70)	(12.56)
未婚女性受訪者							
本人教育	12.61	9.00	14.32	12.74	12.56	11.16	12.00
N=304	(2.42)	(4.24)	(2.03)	(2.22)	(1.86)	(2.79)	(0.00)
本人職業	38.74	23.00	49.58	39.57	36.34	32.78	21.20
N=268	(14.10)	(15.56)	(15.80)	(12.87)	(12.95)	(12.82)	(7.19)
本人收入	19.41	15.00	27.10	20.55	15.67	13.50	10.00
N=254	(15.09)	(7.07)	(19.53)	(16.39)	(7.74)	(5.33)	(0.00)
已婚男性受訪者							
本人教育	9.46	12.67	13.54	11.08	9.41	7.97	5.76
N=1370	(4.48)	(4.72)	(3.90)	(4.03)	(4.11)	(3.93)	(3.80)
本人職業	36.03	53.38	54.84	42.99	36.83	27.67	25.03
N=1300	(18.40)	(24.31)	(18.63)	(18.87)	(17.20)	(13.10)	(10.41)
本人收入	36.14	61.11	62.99	42.55	33.90	25.14	26.41
N=1140	(33.60)	(29.34)	(56.71)	(33.48)	(32.16)	(17.73)	(37.24)
配偶教育	8.03	10.44	11.60	9.60	7.56	6.85	4.39
N=1370	(4.54)	(4.42)	(4.30)	(4.14)	(4.40)	(4.06)	(3.78)
配偶職業	32.90	39.60	45.96	37.48	32.97	27.36	22.38
N=603	(16.06)	(24.13)	(17.70)	(16.89)	(15.64)	(11.94)	(7.43)
已婚女性受訪者							
本人教育	7.66	6.13	11.71	8.87	6.99	6.44	3.61
N=1504	(4.47)	(5.46)	(4.10)	(4.21)	(4.44)	(3.74)	(3.37)
本人職業	31.82	37.67	47.40	34.90	32.19	25.92	22.37
N=758	(15.61)	(18.09)	(19.30)	(15.84)	(13.50)	(11.39)	(7.92)
本人收入	21.86	75.00	37.57	23.63	19.84	15.20	14.55
N=699	(23.37)	(80.62)	(40.95)	(22.27)	(12.38)	(13.72)	(7.94)
配偶教育	9.44	10.63	13.12	10.46	9.07	8.19	6.15
N=1504	4.33	(4.98)	(4.22)	(3.99)	(4.38)	(3.69)	(4.15)
配偶職業	35.03	44.43	50.48	38.23	33.08	28.63	28.00
N=1299	(17.55)	(21.59)	(19.27)	(17.92)	(14.97)	(14.50)	(12.49)

* 表格中的數字爲平均數(括號內數字爲標準差)

** 職業的測量爲 Featherman and Stevens Revised SEI

表九報告了 A 組資料「等級波比模型」的分析結果。首先在「未婚男性」樣本中，呈現本人教育與職業為主要的影響因素，也就是說，本人教育與職業地位越高，所認同的階級也就越高。這個情形也同樣發生在「未婚女性」樣本中，此外，在該樣本中母親教育對「未婚女性」也有顯著的正效應。在「已婚男性」和「已婚女性」兩個樣本中，除了本人教育與職業之外，值得注意的，收入也是決定主觀階級的要素；此外，「已婚男性」配偶（即妻子）的教育和「已婚女性」配偶（即丈夫）的教育與職業，都有助於主觀階級的認同。這個結果套上 Davis and Robinson 的模型，即可說：台灣勞動力市場中的未婚男性較傾向「獨立模型」、未婚女性則兼具有「獨立」和「採借」的現象；已婚者則偏向「共享模型」。¹²

表十報告了 B 組資料「等級波比模型」的分析結果。在「未婚男性」樣本中，本人的社經變項（教育、職業與收入）都達到顯著正效應，一個很清楚的「獨立模型」呈現出來。在「未婚女性」樣本中，除了三個本人社經變項都有顯著影響力之外，父母親教育和父親職業也都有顯著效果，¹³可以說是「獨立」與「採借」的混和模型。至於「已婚男性」和「已婚女性」樣本所呈現出來的情形，大致上和 A 組資料接近，可說是「共享模型」，而且「已婚女性」更凸顯此模型為其主觀階級認同的方式。

雖然 A、B 兩組資料在階級分類上有所不同，但是客觀社經特質

12 在這個模型中，「共享」其實含有相互「採借」之意；其中妻子向先生地位採借的情形似乎比先生向妻子採借為明顯，這和 Philliber and Hiller (1978) 的發現類似。

13 令人不解的，母親教育的影響力雖達到.01 的顯著水準，卻呈現負面的相關。一個可能的解釋，在於母親教育在這些資料中超過 40% 沒有教育（視為 0 年教育），使得母親教育的「效應」不穩定。

表九 主觀階級的社經基礎(A 組)：四等級波比模型分析

	未婚男性	未婚女性	已婚男性	已婚女性
本人教育	.1114***	.1727***	.0570***	.0703***
本人職業	.0103**	.0175***	.0150***	.0106***
本人職業 (0,1) +	.3695**	.1989	-.0063	.1190*
本人收入	.0018	.0014	.0035***	.0036***
本人收入 (0,1)	-.0967	-.4353**	-.0206	-.1503*
父親教育	.0199	-.0060	.0202*	.0101
母親教育	.0322	.0443**	.0111	.0069
父親職業	.0079*	.0000	.0022	.0060*
父親職業 (0,1)	.0953	-.2667*	-.1061	.0715
配偶教育			.0370***	.0471***
配偶職業			.0058*	.0110***
配偶職業 (0,1)			.1126*	-.1053
年齡群			-.2126***	-.0734
資料別	.0751	.0204	.0185	.0395
常數	-.6799***	-.6793*	-.5576***	-.6172***
μ (1)	1.3043***	1.0653***	1.1641***	1.0903***
μ (2)	3.2833***	3.4119***	3.0233***	3.1442***
% predicted	62.6	69.6	52.7	55.7
log-likelihood	-459.7	-297.7	-1313.8	-1278.1
N	476	372	1265	1306
P	.000	.0000	.0000	.0000

*達.10 顯著水準，**達.05 顯著水準，***達.01 顯著水準

+(0,1)為虛擬變項，1代表遺缺值。

的解釋，仍有某種程度的相似；尤其是「個人教育」在其他因素恆定下，其影響力在各群體中都是相當明顯的，不論主觀階級是五分類還是六分類，教育對於個人認同的影響都是不容忽視的。基本上，我們

表十 主觀階級的社經基礎(B組)：五等級波比模型分析

	未婚男性	未婚女性	已婚男性	已婚女性
本人教育	.0997***	.0859**	.0519***	.0491***
本人職業	.0143***	.0150**	.0148***	.0081***
本人職業(0,1) ⁺	.1503	.2649	.2202**	.0958
本人收入	.0081**	.0131**	.0048***	.0084***
本人收入(0,1)	-.0816	-.1412	-.2253***	-.1306*
父親教育	.0122	.0513**	.0015	.0022
母親教育	.0181	-.0634***	.0072	.0309***
父親職業	.0021	.0087**	.0036	.0042
父親職業(0,1)	.0731	-.1214	.0125	.0146
配偶教育			.0206*	.0311***
配偶職業			.0071**	.0090***
配偶職業(0,1)			-.0331	-.2379***
年齡群			-.0609	.0050
資料別	.0289	-.2379	-.1001*	-.1240**
常數	-.4604**	0.2509	-.0813	-.0005
$\mu(1)$	1.4883***	1.4377***	1.3317***	1.2131***
$\mu(2)$	1.8575***	1.8549***	1.7419***	1.5768***
$\mu(3)$	3.5146***	3.7535***	3.3079***	3.2642***
% Predicted	55.1	57.2	48.6	46.8
log-likelihood	-500.1	-329.2	-1724.3	-1886.6
N	410	304	1370	1504
P	.000	.0000	.0000	.0000

*達.10 顯著水準，**達.05 顯著水準，***達.01 顯著水準

+ (0,1)為虛擬變項，1代表遺缺值。

可以說台灣勞動力市場中的「未婚男性」主觀階級認同方式屬於「獨立型」，「未婚女性」屬於「獨立型」和「採借」的混和，已婚男女則均傾向「共享型」。

由於上述這個結果並不能告訴我們有關「中下階級」與「工人階級」相對位階的關係；於是，筆者將 B 組資料中的「中下層」與「工人」合併為一類，重新以「等級波比模型」分析，結果報告在表十一。如果將表十一和表十來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四個樣本社經變項重要性的改變非常有限，可以說不論「中下層」與「工人」是否合併，社經特質對於主觀階級認同的解釋並沒有什麼變化。另外還可以從門檻係數的比較得知，雖然表十一少了「工人」和「中下層」之間的門檻，其餘二個係數幾乎沒有什麼改變。¹⁴

為了具體說明這三個表所呈現的異同，本研究在一假設條件下（眾數條件：即受訪者\配偶有 9 年教育、本人\配偶職業地位 RSEI 為 35、本人每月收入 28,000 元、父母親教育皆為 6 年、父親職業 RSEI 為 30、出生於 45 以後、資料別為二期二次(II)或二期三次(II))分別來計算每一個群體認同各階級的機率，並報告於表十二。¹⁵

來自 A 組資料的分析結果（表九）在上述條件下的機率，和來自 B 組資料的兩種分析結果（表十和表十一），可以在表十二中作清楚的對照。從報告中可以看出一些基本差異：例如 A 組資料呈現「中層階級」的機率明顯較高，呈現「下層階級」的機率也略較 B 組為高。如果 B 組資料的「中下層」與「工人」合併，此合併類所產生的機率只比原來兩個階級機率之和略低一點，卻明顯高於 A 組資料中「工人階級」的機率。從這個例子以及前述的分析，可說明 B 組資料在社經變項控制下，「中下層」與「工人」不論是否合併，其它幾個階級類別的

14 表十的 $\mu(2)$ 與 $\mu(3)$ 和表十一的 $\mu(1)$ 與 $\mu(2)$ 相近，意指控制社經變項作用後，認同上／中上層與中層的條件機率，在這兩個模型中類似。

15 這個眾數條件只是一個假想案例作為示範以便於說明，並非「事實」(reality) 的描述。

表十一 主觀階級的社經基礎(B組)：四等級波比模型分析

	未婚男性	未婚女性	已婚男性	已婚女性
本人教育	.0978***	.0715*	.0484***	.0518***
本人職業	.0124***	.0157***	.0132***	.0063**
本人職業(0,1) ⁺	.1170	.3094	.1704*	.1099
本人收入	.0072*	.0129**	.0046***	.0080***
本人收入(0,1)	-.1287	-.1334	-.2957***	-.1918**
父親教育	.0087	.0475**	.0029	.0030
母親教育	.0249	-.0596**	.0078	.0295***
父親職業	.0035	.0098**	.0031	.0048*
父親職業(0,1)	.1267	-.0523	-.0135	.0003
配偶教育			.0261**	.0288***
配偶職業			.0065*	.0088***
配偶職業(0,1)			-.0453	-.2305***
年齡群			-.0550	.0284
資料別	.0878	-.2085	-.0757	-.0932
常數	-.4177*	0.3271	.0065	.0659
$\mu(1)$	1.8384***	1.8284***	1.7317***	1.5781***
$\mu(2)$	3.4890***	3.7222***	3.2880***	3.2633***
% Predicted	61.0	60.5	56.1	53.4
log-likelihood	-393.1	-274.4	-1358.5	-1514.6
N	410	304	1370	1504
P	.000	.0000	.0000	.0000

*達.10顯著水準，**達.05顯著水準，***達.01顯著水準

+(0,1)為虛擬變項，1代表遺缺值。

機率分佈仍會相當接近。這個現象意含著，兩類階級合併與否，民眾對「階級結構」認知的變化並不大，但這並不是說「中下階級」與「工人階級」相似而可相互替代；比較可能的情形，是兩者對於社經變項的關係相似，但具有不同的條件均數 (conditional means)；而前面

表十二 三個等級波比模型各階級的機率*

	資料	下層	工人	中下	中	中上+上	合計
未婚男性	A	.0869	.3932		.4931	.0268	1.000
	B	.0749	.445	.1429	.3184	.0188	1.000
	B+	.0681	.5687		.3404	.0228	1.000
未婚女性	A	.0375	.2045		.7075	.0505	1.000
	B	.0307	.3029	.1703	.4667	.0294	1.000
	B+	.0294	.4427		.4943	.0336	1.000
已婚男性	A	.1210	.3750		.4718	.0322	1.000
	B	.0708	.3722	.1634	.3607	.0329	1.000
	B+	.0643	.5189		.3784	.0384	1.000
已婚女性	A	.0618	.2646		.6188	.0548	1.000
	B	.0392	.2520	.1374	.5046	.0668	1.000
	B+	.0344	.3708		.5213	.0735	1.000

*：機率的計算乃根據一假想條件，即受訪者、配偶有 9 年教育、本人、配偶 RSEI 為 35、本人每月收入 28,000 元、父母親教育皆為 6 年、父親 RSEI 為 30、出生於 45 以後、資料別為二期二次(II)或二期三次(II)。

B+：B 組資料中「工人階級」與「中下階級」合併。

的描述統計也已顯示，認同「中下層」的社經條件較認同「工人階級」高些。

六、「中層」、「中下」和「工人」階級的區別

我們對「中下層」與「工人」兩個階級的關係有了進一步認識之後，還有一個問題尚未釐清——即「中下層」的「介入」究竟會和相鄰的階級發生何種效應？本節的討論將應用「多重對數迴歸模型」針對 B 組資料中的「中層」、「中下層」、和「工人」三個階級來作多變項控制的分析。採用這個模型，乃假定部分受訪者需從這三類階級中選

擇其一為其階級認同。從模型的分析中，我們嘗試找出哪些社經因素使得受訪者選擇了「中層」而不是「中下層」，或選擇了「工人」而不是「中下層」？

表十三報告了有關「中層」、「中下層」、與「工人」的多重對數迴歸分析結果，表的上半部為「工人階級」（對照組）與「中下階級」（參考組）的對照，表的下半部為「中層階級」（對照組）與「中下階級」（參考組）的對照。首先，在「未婚男性」樣本中，決定「工人階級」或「中下階級」的唯一重要社經因素為「本人職業」，職業地位越高越傾向於選擇「中下階級」而不是「工人階級」；此外「本人收入」也有些影響但不十分顯著（ $\alpha < .10$ ），其作用方向和職業地位同。在「中層階級」或「中下階級」的選擇中，只有「個人教育」有些微的顯著效應（ $\alpha < .10$ ），而其他社經變項的影響力都不顯著。

在「未婚女性」樣本中，決定「工人階級」或「中下階級」的重要社經因素只有「本人教育」，教育程度越高越傾向於選擇「中下階級」而不是「工人階級」；在「中層階級」或「中下階級」的選擇中，也只有「父親職業」有顯著效應，即父親職業地位高者傾向「中層階級」認同，至於其他社經變項的影響力都不顯著。

在「已婚男性」樣本中，決定「工人階級」或「中下階級」的主要社經因素除了「本人教育」外，「本人收入」以及「本人職業」都有顯著影響；而三者的提昇都傾向於選擇「中下階級」而不是「工人階級」。在「中層階級」或「中下階級」的對照中，「配偶教育」具有顯著效應，即配偶教育程度高者傾向「中層階級」認同，而其他社經變項的作用在.05水準下都不顯著。

最後，在「已婚女性」樣本中，影響決定「工人階級」或「中下階級」的主要社經因素為「本人職業」，職業地位越高越傾向於選擇「中

表十三 中層、中下與工人階級的社經成分：多重對數模型分析

	未婚男性	未婚女性	已婚男性	已婚女性
工人階級 VS.中下階級				
常數	3.3398***	2.2838**	3.0671***	2.7474***
本人教育	-.1090	-.2712**	-.0675*	-.0053
本人職業	-.0373***	-.0013	-.0299***	-.0341***
本人職業 (0,1) +	-.4184	.9373	-.8293	.1567
本人收入	-.0189*	-.0313	-.0108**	-.0112
本人收入 (0,1)	-.5354	.2326	-.4486*	-.7593***
父親教育	-.0358	-.0966	.0135	.0094
母親教育	.0638	.1124	.0113	-.0436
父親職業	.0173	.0193	-.0063	.0106
父親職業 (0,1)	.6185	.7349	-.3210	-.2675
配偶教育			.0375	-.0588*
配偶職業			-.0114	-.0076
配偶職業 (0,1)			-.1133	.3505
年齡群			.1380	.4205*
資料別	.7674**	.6621	.3658*	.6452***
中層階級 VS.中下階級				
常數	-1.3067	.1822	.2765	.3982
本人教育	.1212*	-.0744	-.0093	.0669**
本人職業	-.0012	.0125	.0068	-.0172*
本人職業 (0,1)	-.1177	1.0291	-.5256	.3307
本人收入	.0035	.0330	.0053	.0074
本人收入 (0,1)	-.1417	-.6096	-.3823	-.6576**
父親教育	-.0160	-.0340	.0471*	-.0074
母親教育	.0596	-.0047	.0028	.0580*
父親職業	.0175	.0446***	-.0011	.0104
父親職業 (0,1)	-.1118	-.9163	-.3402	-.1357
配偶教育			.0716**	-.0050
配偶職業			-.0037	.0105*
配偶職業 (0,1)			-.2516	.1167
年齡群			-.2139	.1793
資料別	.6969**	.4789	.0638	.3599*
% predicted	61.6	67.7	59.8	57.7
log-likelihood	-311.7	-193.2	-1015.6	-1140.0
N	359	260	1130	1254
P	.0000	.0000	.0000	.0000

* 達.10 顯著水準，** 達.05 顯著水準，*** 達.01 顯著水準

+ (0,1) 為虛擬變項，1 代表遺缺值。

下階級」而不是「工人階級」。在「中層階級」或「中下階級」的選擇中，只有「個人教育」有顯著效應，即教育程度高者傾向「中層階級」認同；此外，除了母親教育與配偶職業有些微影響力外，其餘社經變項的影響力都不顯著。

從多重對數迴歸的分析來看，除了未婚女性外，「個人職業」很明顯地是決定一個人去選擇「工人階級」或「中下階級」的重要依據，即職業地位低者傾向於自認是「工人階級」；反之，則傾向於「中下階級」認同。值得注意的，在「工人階級」或「中下階級」的對照中，四個群體模型的常數項都具有顯著性；這意味著在社經變項控制下，「工人階級」與「中下階級」仍具有明顯差別。配合前節的說法，筆者認為「工人階級」與「中下階級」替代性並不高，雖然兩者的社經基礎頗為類似，但仍可以視個人社經地位高低來區隔兩個階級的認同，其中尤以職業地位的高低最具判準（未婚女性除外）。

至於「中層階級」與「中下階級」差異的解釋，個人社經地位的重要性並不明顯，只有在已婚女性中，才顯現出教育水平高者傾向於選擇「中層階級」的情形；其他社經變項的作用只有在未婚女性組中父親的職業地位，以及已婚男性組中配偶的教育是顯著的。此外，在社經變項控制下，四組樣本中的常數項係數均不顯著，令人質疑民眾在這兩個階級中所做的選擇可能沒有清楚的根據。換句話說，從B組資料顯示，民眾可能選擇「工人階級」或「中下階級」會依據其職業地位的高低；但對於選擇「中層階級」或「中下階級」，既不是依據職業，也不像是其他社經特質。如果我們相信社經特質「應該」是主觀階級認同的基礎；那麼，這個發現似乎在說，「中下階級」的介入主要模糊了「中層階級」的界線，使得民眾在這兩個階級間所做的選擇，似乎沒有清楚的規則可循。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可能是「中層階

級」有虛胖的傾向，才會令「中下階層」，產生「介入」的效果。前面表二也曾報告，B 組主觀階級多了「中下層」，而「中層」比例（相對於 A 組資料）有明顯降低的現象。如果台灣在一兩年間（這幾筆資料大約在 1990-92 間蒐集的），階級結構沒有重大變化，那麼應該是「中下層」的加入奪走了一部分原為「中層階級」認同者；而「中下層」的出現仍可以和「工人階級」在社經特質上有所區別。

七、結論

「主觀階級認同」是個人察覺其自己在地位階序中的位置 (Jackman and Jackman 1973)，研究者常用它來了解階級的存在以及一個社會的階級結構。由於階級概念的產生和該社會的歷史、經濟、政治……等結構和發展有關，我們不必然以複製國外的做法來理解自己社會的「階級結構」；甚至有人懷疑，「階級」只是研究者賦予的概念而非實存於社會當中。本研究不擬重複過去國人對於階級、中產階級、或工人階級的定義、理論、或形成過程的探討，而以分析現有資料為主；假設民眾在問卷上回答的所屬階級乃為一理性選擇行為，以此為基礎，來了解民眾的主觀階級認同的決定因素。

此外，國內社會科學研究中也常涉及「主觀階級」的調查，研究者為了避免在五分類階級中出現「中層（產）階級」的虛胖，而考慮加入「工人階級」與\或「中下層階級」。尤其在近年「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中主觀階級認同的測量，發生「中下層階級」或\和「工人階級」設計上的兩難，促使筆者採用多筆資料（具有階級五分類（A 組）和六分類（B 組）的不同調查）的比較，應用較精細的統計方法，試圖分析台灣地區民眾主觀階級認同的社經特質，並進一步了解「中下

層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差異。又考慮及個人在生命過程角色地位的轉換，可能影響其階級的認同，按受訪者性別與婚姻狀況，將樣本區別為「未婚男性」、「未婚女性」、「已婚男性」和「已婚女性」四個群體，分別作為分析的對象，並用來測試 Davis and Robinson (1988) 的三個階級認同模式。

有關主觀階級的社會經濟特質之描述，A、B 兩組資料都呈現從中上階級到下層階級下降的趨勢，這個現象與期望中的情形相符。由於 B 組資料多了「中下層」，從其社經特質的描述來看，「中下層」很清楚地介於「中層」與「工人」之間。此外，在四個群體的比較中，「未婚女性」所認同的階級普遍較其他三個群體為高。

由於主觀階級類別之間較接近等級的關係，用一般「最小平方法」的迴歸分析，假定依變項是連續性測量或至少是等距 (interval) 層級測量，並不恰當；尤其不論在五分類或六分類階級中，「上層階級」所佔比例往往低於百分之一，使得依變項的變異範圍非常有限，這種情形很容易造成參數估計值的缺乏有效性 (inefficient)。因此，關於主觀階級社經內涵的多變項分析，本研究採用「等級波比模型」；在區別「中下層階級」與其鄰近階級（「中層階級」與「工人階級」）時，則採用「多重對數迴歸模型」。

根據「等級波比模型」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說台灣勞動力市場中的「未婚男性」主觀階級認同方式偏向「獨立型」，「未婚女性」屬於「獨立型」和「採借」父母親社經地位的混和型態，已婚男女則均傾向「共享型」，也就是個人和配偶的社經特質都是階級認同的參考因素，而其中又以丈夫社經特質的影響力較為明顯。值得特別注意的，無論是哪一個群體，對主觀階級認同最具影響力的社經變項為「個人教育」。本研究進一步將「工人階級」與「中下階級」合併，重新分析

並和原本模型對照，發現在社經變項控制下，「中下層」與「工人」不論是否合併，其他階級的機率分佈仍相當接近；這意味著兩類階級不論是否合併，民眾對「階級結構」認知的改變應該不大。

最後，本研究探討「中下層」的「介入」究竟會和相鄰的階級發生何種效應？透過多重對數迴歸分析，來分辨「中下層」和「工人階級」與「中層階級」認同的差異。這部分的分析發現，除了未婚女性是以個人教育為依據外，本人職業是另外三個人口群認同「中下層」或「工人階級」的主要判準；至於民眾何以會選擇「中下層」或「中層階級」，除了已婚女性教育水平高者傾向於選擇「中層階級」，另外三個人口群的個人社經變項並不足以來說明；加上常數項係數推估的不顯著，此模型似乎不能反映出這兩個階級的區隔規則。配合「等級波比模型」分析結果，可綜合來說：如果在常用的階級五分類（上、中上、中、工人、下）中加入「中下層」，一些社經地位（尤其是職業）較高的「工人階級」有可能轉為認同「中下階級」；值得注意的，會有更多原為「中層階級」者可能轉而選擇「中下階級」，而這種移轉並沒有可靠規則可尋，也許這些人自認不是「工人」又不願屈就「下階層」，在五分類時選擇了「中層階級」，一旦有「中下層」也就逕自擇取為其認同之對象。這對於認為台灣「中層階級」「虛胖」者而言，加入「中下層」既可「瘦身」又可以和「工人階級」區別，似乎仍是可以考慮的辦法。

主觀階級內涵為何？階級認同與客觀社經特質究竟有何關連？一向是階級研究者所關切的課題；本研究站在這個脈絡下，先整理「社會變遷」關於主觀階級認同的資料，對照不同階級分類的分佈情形，然後將研究課題鎖定在兩筆階級五分類資料（二期一次（I）二期二次（II））與兩筆階級六分類資料（二期三次（I）（II））作為分析對象。

不可否認地，研究的運作受制於所選定資料的品質與內容，對於上述的問題也只能很有限地回答，尤其是有關職業類別或從業身份等變項並未在本研究中處理。¹⁶或許還有許多研究的重點在本研究中忽略了，希望讀者提供研究經驗與寶貴意見，作為未來繼續發展研究之參考。

參考文獻

吳乃德

- 1994 「階級認知和階級認同：比較瑞典、美國、台灣，和兩個階級結構」。許嘉猷主編《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集》，頁 109-151。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黃毅志

- 1994 「台灣地區民眾主觀階級認同」。《東吳社會學報》3:265-301。

許嘉猷

- 1987 「台灣的階級結構」。《中國社會學刊》11:25-60。
- 1989 「台灣中產階級的估計及其社會經濟特性」。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頁 57-76。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1994a 《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集》（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1994b 「階級結構的分類，定位與估計：台灣與美國實證研究之比較」。許嘉猷主編《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集》，頁 21-72。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許嘉猷、陳心瑩、陳雪慧、許智香

- 1994 「問卷基本資料分析」。許嘉猷主編《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

16 關於職業類別或從業身份等變項，一方面因缺乏配偶相關資料；另一方面因變項操弄所需，許多職業類別或從業身份必須予以歸併與簡化，其結果將使分析的樣本改變。基於這些考慮，本研究將重點置於社經變項，對於職業類別與從業身份的影響已在作者一相關研究（民國 84 年國科會計畫）中處理。

集》，頁 1-20。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蔡淑鈴

- 1989 「中產階級的分化與認同」。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頁 77-96。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蔡淑鈴、瞿海源

- 1989 「主客觀職業量表之初步建構」。伊慶春和朱瑞鈴主編《台灣社會現象的分析：家庭、人口、政策與階層》，頁 477-516。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蕭新煌（編）

- 1989 《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1994 「新中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台灣、美國與瑞典的初步比較」。許嘉猷主編《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集》，頁 73-108。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薛承泰

- 1996 「台灣地區職業地位測量與性別差異。」《調查研究》1:67-121。

瞿海源（編）

- 1991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二期第一、二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2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二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3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二期第四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4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二期第五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Aldrich J.H. and F.D. Nelson

- 1984 *Linear Probability, Logit, and Probit Models*. Sage: Quantitative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45.

Amemiya, Takeshi

- 1985 *Advanced Econometr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aveman, Harry

- 1973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Centers, Richard

- 1949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ahrendorf, Ralf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avis, N.J. and R.V. Robinson

1988 "Class Identification of Men and Women in 1970s and 1980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103-112.

Drudy, Sheelagh

1991 "The Classification of Social Class in Sociological Research."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2(1): 21-41.

Erikson, Robert

1984 "Social Class of Men, Women, and Families." *Sociology* 18: 500-514.

Featherman, David L. and Gillian Stevens

1982 "A Revised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Application in Analysis of Sex Differences in Attainment." pp. 141-181 in Robert M. Hauser (ed.) *Social Structure and Behavior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Hamilton Sewell*. Academic Press.

Fortune Surveys

1940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a Self Portrait." *Fortune* 21.

Giddens, Anthony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Giddens, Anthony and David Held (eds.)

1982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ldthorpe, John H.

1983 "Women and Class Analysis: In Defense of the Conventional View." *Sociology* 17: 465-488.

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ross, Neal

1953 "Social Class of Identification in the Urban Commun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 398-404.

Grusky, David B. (ed.)

1994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

- tive*. 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
- Hiller, Dana V. and William W. Philliber
1978 "The Derivation of Status Benefits from Occupational Attainments of Working Wiv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0: 63-70.
- Hodge, Robert W.
1986 "Comment on Class Aware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473-478.
- Hodge, Robert W. and Donald Treiman
1968 "Class Iden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3: 534-547.
- Hsiao, Hsin-Huang Michael
1989 "The Middle Classes in Taiwan: Origins, Formation, and Significance." pp. 151-166, in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t al. (eds.) *Taiwan: A Newly Industrialized State*. Taipe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Jackman, Mary R. and Robert W. Jackman
1973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569-82.
1983 *Class Aware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ahl, Joseph, and James A. Davis
1955 "A Comparison of Indexe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 317-325.
- Kluegel, J.R., Royce Singleton Jr., and Charles E. Starnes
1977 "Subjective Class Iden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599-611.
- Lockwood, D.
1966 "Sources of Variations in Working-Class Images of Society." *Sociological Review* 14: 249-267.
- Parkin, Frank
1971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apitalist and Communist Societies*. New York: Praeger.
- Poulantzas, Nicos
1973 "On Social Classes." *New Left Review* 78: 27-54.
- Philliber, William W. and Dana V. Hiller

- 1978 "The Implication of Wife's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for Husband's Class Identification."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 450-458.
- Ritter, Kathleen V. and Lowell L. Hargens
1975 "Occupational Positions and Class Identifications of Married Working Women: A Test of the Asymmetry Hypo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 934-948.
- Robinson, Robert and Jonathan Kelly
1979 "Class as Conceived by Marx and Dahrendorf: Effects on Income Inequality,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the U.S. and Great Brita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 38-58.
- Romer, John
1982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hils, Edward A.
1968 "Deference." pp. 104-32 in J.A.Jackson(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ological Studies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Velsor, Ellen and Leonard Beeghley
1979 "The Process of Class Identification Among Employed Married Women: A Replication and Reanalysi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1(November): 771-778.
- Vanneman, Reeve and Fred Pampel
1977 "The American Perception of Class and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422-437.
- Weber, Max
1969 "Class, Status, and Party." pp. 24-34, in Celia S. Heller (ed.) *Structured Social Inequality*, London: Macmillan.
- Wright, Erik Olin
1989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pp. 3-43, in E.O. Wright (ed.) *The Debate on Classes*. New York: VERSO Press.
1994a "The Middle Class in Marxist and Weberian Class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st Asian Middle Classe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ec 19-21,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1994b "Varieties of Marxist Conceptions of Class Structure." pp. 94-154, in David B. Grusky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

Wright, Erik Olin, David Hachen, Cynthia Costello, and Joey Sprague

1982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709-726.